

舊時代的新人物

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蹟簡介

顏 高 飛

從傳統的「士大夫」蛻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是觀察近/現代中國歷史變遷的重大面向之一，蔡元培（1868—1940）的生命道路，便是從傳統的「士大夫」如何蛻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的具體縮影。蔡氏十七歲考中秀才，二十三歲考中舉人，二十四歲考中進士，旋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歲在北京應散館考試，旋由庶吉士升補翰林院編修。他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至此到了頂峰，若依循古代傳統士子的努力目標，他大可沿著這條既定的仕途邁進，躋身達官顯貴的行列。但是，對時代鉅變的認知與抉擇，他卻選擇了另一條迥然不同的路。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的坦途時，也正是國家內憂外患，清王朝日暮窮途之日。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政府派李鴻章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八九八年，由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的戊戌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康、梁避走海外，「六君子」被殺。這兩件事件，對中國人民是個大震動，也震撼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心靈。蔡氏也敏銳的感受到這股衝擊，更察覺到當時知識界要求變革的新思潮，從此，他關心時局，尋求救國的新出路。

探索蔡氏一生思想的轉變及志業的選擇是饒富趣味而深具意義的，與同時代的王國維先生作一比較，王氏在中國古代史學、古代通俗文學，甲骨文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傑出的成就

與貢獻，但或許長期與羅振玉、沈曾植、升允等清室遺老交往，後來並入故宮充「南書房行走」，當清遜帝溥儀的老師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將溥儀驅逐出宮時，他為了表示對清室的效忠，曾幾次企圖投「御河」自殺未果；一九二七年，廣東革命政府組織節節勝利，王氏對這種演變深感不解和恐懼，而對清朝統治垮臺的現實，以及他原先想在清官方機構裡以學術研究取得精神寄託的幻想破滅，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苦悶之中，在極度的失落與憂鬱中，終於在是年六月二日清晨投頤和園昆明湖而死，留下遺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關於王氏的死因，後人曾有過種種猜測和爭論，有一說他是「殉清」而死；有以為是受叔本華悲觀主義人生觀的影響，因不堪周圍現實的種種困擾，遂以死自求解脫。而郭沫若則認為，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身上激起了劇烈的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滿清末年西方列強挾著船堅利對古老衰頹的中國展開無情的侵凌與掠奪，誠所謂是「千古未有之變局」，這對當時傳統知識分子所造成的衝擊與心靈的屈辱是不可言論的，王氏的作為同樣成全了自我，這是我們今天讀史所應秉持的一份尊敬、包容和諒解。

蔡元培如何從一個前清的翰林轉變成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他主張暗殺手段，並曾加入



拾貳、廉吏列傳





拾貳、廉吏列傳



秘密暗殺組織，學習研製炸藥）？如何從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新時代的教育家？蔡氏青少年時代接受的核心教育是忠孝仁義，例如，母親病重，他「割臂肉為藥」，母親死後，他「寢苦枕塊」；而一九〇二年，卻在家鄉創辦愛國女校，這在當時保守的環境中，是一項了不得的創舉；後來接任北京大學校長，更首開先例，招收女生入校。一九〇〇年，蔡氏元配王昭女士病逝，他公開提出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不相合，可離婚。在當時，這是衝破禮教束縛的大舉動。蔡氏的一生，十一歲喪父，是寡母扶養長大力爭上游的孝子；三十歲之前是典型的清朝文人；中日甲午戰敗，戊戌維新變法運動流產，世代的鉅變令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對歷史和現實作深刻的檢討與反思。因此，三十到四十五歲，蔡氏成了狂熱的革命黨人；民國初立，他選擇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曲折璀璨的一生，令人嘆為觀止。或許，我們可從蔡氏學習的過程對照世局的演變方能較深入、全般的瞭解其心境的轉折，志業的抉擇。

蔡氏從童年至十六歲之前，接受的是傳統的學習方式。先是得六叔蔡銘恩的細心指導，十歲後就讀於家對門李中甫先生所設的私塾；十四歲以後進入經學名宿王子莊塾館，學八股文及宋儒之學。在這段讀書生涯中，對他有較深遠的影響的是他的叔父銘恩，銘恩是清末廩生，工制藝，並治詩文及古文辭，藏書不少，蔡氏十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等書。一八八三年，蔡氏時年十七歲考中秀才，在讀書上開始了自由閱讀的階段，除閱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大戴禮記諸書外，並擴大閱讀範圍，有關考據、詞章之學亦均檢閱。二十歲時受聘

於同鄉徐樹蘭學習，並兼校書刻印工作，徐氏藏書極多，蔡氏均遍覽，至此學問又更進一步。可見蔡氏對中國舊學曾下過苦工，所以應科舉考試連試皆捷，蔡氏在少年時期已名動公卿，曾被同治、光緒兩朝帝傳，清末維新運動「第一導師」（康有為語）的翁同龢譽為「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可見蔡氏舊學根基的深厚。

蔡氏在學問和事業上都有大成就，一方面固然靠天資，另一方面則靠他的勤勉，可以說一生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一九〇七年六月，四十一歲時赴德國留學，首先學習德語，並進入萊比錫大學苦讀，三年之內選讀了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心理學、美學等四十多門科目，只要時間不衝突，他都盡量選聽。蔡氏以翰林之尊，年屆不惑，遠渡重洋，學習如此多的科目，好學精神可見一斑。民國元年，蔡氏辭去教育總長職務後，旋又攜眷再赴德國，再度進入萊比錫大學聽講；民二年至五年又赴德、法考察，在法國曾學習法語，並攻讀哲學，十四年又到德國漢堡研究民族學。初次赴德國留學三年多的時間，主要是獲得當時駐德公史孫寶琦資助，並經由孫之介紹，擔任當時在柏林學習的唐紹儀子侄寶書、寶瀚等四人的家庭教師，講授國文，月入一百馬克；並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書籍，館方每月致送編譯費支持其留學費用所需，生活相當刻苦。曾於致函吳稚暉的信中自述三年多的學習狀況：「來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識，如於滿屋散錢中，暗摸其一二而無從聯貫；又或拾得他人遺棄之錢串，而曾不名一錢，欲摸索一二相當之錢從串之，而顧東欠西，都無著落，惟終日手忙腳亂，常若債負與日俱增，而不知所屆。……，蓋弟從前受中國讀書人之惡習太深，年來雖痛自洗濯，而終未能脫者。……，所幸半傭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強過去，再歷數年，或者摸得之散

錢稍富，而漸有適當於斷爛錢串者，得聯合以爲小小之結束，則庶幾不負故人之期望矣。」信中，寫出一個讀書人清貧、時間緊迫，汲汲於求知的形象。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蔡氏已深刻認知，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圖強無望，非澈底革命不能救國。一九〇二年，創辦中國教育會，自任會長，中國教育會成立的初衷，是爲了推進教育事業的發展，而更深一層的意圖是啓發民衆，使青年走向革命，這當然與蔡氏的指導思想有關。宥於當時財力、物力、人力的關係，中國教育會在教育方面的工作，並沒有很好的開展，但它在積聚革命力量、傳播革命思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並參加「蘇報」，作爲倡言革命的根據地，思想激進，言論激烈；復與吳稚暉等人發起上海張園演說會，公開抨擊滿清。他當時是中國教育會會長、愛國學社總理、愛國女校校長，由於他的帶領鼓吹言論，使東南人士風起雲湧，紛紛加入國民革命軍的陣營，也因此引起清廷的忌恨，是當時清廷嚴論捉拿革命要犯的榜首。一九〇四年蔡氏參加光復會組織，並被推舉爲會長，發行「日俄事件警聞」，不久又擴充爲「警鐘日報」，取代被封閉的蘇報，更屢在報上發表犀利的革命言論，激起熱烈的迴響。一九〇五年，正式加入同盟會。光復會在清末革命運動發生相當重要的影響，這和蔡氏開創之功是密切相關的。孫中山先生曾譽之曰：「光復會有徐錫麟之殺恩銘，熊成基之襲安慶，近者攻上海、侵浙江、下金陵，則光復會新舊部人皆與有力，其功表見天下。」

蔡氏認爲欲圖改革，首先應從教育下手，並認爲康、梁變法維新失敗的原因是沒有事先培養人才。重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深切體認，影響了他一生戮力的志業，影響後世深遠。蔡氏十八歲至十九歲，開始任塾師；三十二歲受

聘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三十五歲任上海南洋公學教師，一九〇二年並與吳稚暉、章太炎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被推爲會長；同年十一月間南洋公學學生反對教員的專制，相率退學，外界歸罪於蔡氏提倡民權思想的影響所致，他乃引咎辭職，後應學生要求，成立愛國女校後並兼任校長。民國成立後，擔任教育總長，六年起，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又主持大學院兩年，中央研究院十餘年，終其一生，始終沒有離開教育的崗位。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物，創建於一八九八年。北京大學從創立到蔡氏接任校長之前，校風陳腐不堪，學校像個衙門，無絲毫學術氣氛；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其中有些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有些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真正有學術底子的教師可謂鳳毛麟角。學生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京大學更有一種壞現象，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直奔「八大胡同」（當時特種行業聚集的場所），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衆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在這裡，教授被稱爲「中堂」或「大人」，學生則被叫做「老爺」，觀念滯怠，封建氣息瀰漫。一九一七年四月，蔡氏正式到北大視事，大刀闊斧地推行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教育改革，他提倡民主和科學的思想，以「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原則，首先從整頓校風，改變觀念入手。在就任校長的首次演講中，即闡明了大學的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爲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爲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爲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具有真知遠見，認爲建立一支有真才實學而又熱心教育事業的教師陣容，是辦好學



拾貳、廉吏列傳





拾貳、廉吏列傳



校的關鍵。因此，他多方奔走，廣羅人才，如聘請主張文學革命的激進知識分子陳獨秀任文學院院長（蔡氏當時可能也沒料到陳氏不僅是一位文學院長，而且還是兩年後爆發的五四運動總司令）。後來，又陸續聘請了胡適、魯迅、錢玄同、周作人、馬寅初等知名學者赴北大任教，集中國優秀人才於一堂。蔡氏聘請教授，不受年齡與學歷的拘束，不拘一格，惟才是舉；如胡適當初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因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的文章，讓蔡氏有深刻的印象，乃聘請他到北大任教，當時才只二十八歲，朱家驊二十六歲、劉文典二十八歲；最年輕的是梁漱溟，只有二十四歲，梁氏中學畢業後未進大學，因自修哲學有獨到的學養與見解，蔡元培認為是「一家之言」，乃破格請其至北大講授印度哲學。對於各學派學說，蔡氏提倡讓學生獨立思考，有自由選擇的餘地，絕非用強制灌輸的方式去束縛學生的思想。在教育思想方面，則始終堅持百家爭鳴，相容並包的原則；他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相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任他們自由發展。」又說：「我素信學術上之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話，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對教育的開明，尤其見諸他下述的一段話：「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摻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利的。……，政黨不能常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給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所以教育事業

不可以不超然於各黨派之外。」也由於在這種開明思想的指導之下，當時北大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幾乎每週都有學術講座，自由討論的氣氛十分濃厚。而教員中，從舊時代的進士、新時代的博士，到任何資格都沒有的人，不問其政治態度、學術派別；不論年紀大小，只要有學問，都一視同仁。因此當時北大教員中胡適與錢玄同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等仍極端維護文言文的文學，卻並存而不排斥。也因為如此，北大校園內不但人才雲集，而且革新和守舊針鋒相對，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當然也包含陳獨秀、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容匯各種學說，並讓各種學說通過雙方或多方的辯論較量，讓新生的戰勝腐朽的，先進的戰勝落後的，真理戰勝謬論，也讓新思想、新文化激發出來。蔡氏以上的整頓和改革，提高了北大的學術水準，創造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學風，北京大學一改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後來更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一九二八年創辦中央研究院，並辭去其他職務，專任中央研究院長，直至逝世，歷時十三年。他敦請了一些學者主持各科的研究工作，提攜了趙元任、翁文灝、董作賓、李濟、傅斯年、陶孟和、任鴻雋一批優秀的人才，為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蔡氏對個人一生進退出處絕不含糊，三十三歲時，戊戌變法失敗，深感清廷腐敗已不可救，不屑再和清廷官僚為伍而請假離京，是年任中西學堂監督，因支持教員中的新派，遭舊派忌恨，憤而辭職。三十五歲時任教南洋公學，因學生發生學潮，校方無理開除學生，蔡氏支持學生一起退出公學，與中國教育會同仁創立愛國學社，接納退學學生。民國元年，袁世凱排擠國民黨，他不滿袁專權，又和國民黨閥員王寵惠，宋教仁等退出內閣而辭去教育總長。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五四運動爆發，北洋政府濫

捕學生，當他得知火燒趙家樓有三十二名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的消息後，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深表同情，當即與北京其他各校校長聯合表示：「為要求釋放被拘留諸同學，鄙人願負完全責任。」不顧教育部下達的對於學生當嚴盡管理之責，有不遵守約束者，應立即予以開除，不得姑息縱容的訓令，親自出面斡旋，積極營救被捕學生，面對軍閥統治之惡濁環境，蔡氏堅不妥協，以辭職相抗。作為五四運動的延續，六月三日以後，上海人民發動大規模罷工、罷課和罷市，繼而波及全國，反帝反封建的狂潮席卷全中國，北京政府迫於壓力，乃屈服敦請蔡氏復職北大校長。

從一件事足見蔡氏公而忘私，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他為南洋公學遭退學學生創辦之愛國學社正式開學，他對愛國學社寄予很大的希望，在籌設愛國學社之時，他的長子阿根正患重病，他因為奔走於學社之事，無暇照顧孩子，當他臨行之時，家人趕到碼頭，告訴他阿根已經氣絕，他揮淚囑託送行的朋友，為他代處理兒子後事，毅然登船而去，其無私、重然諾的精神可見一斑。蔡氏自奉儉約，先後擔任三年的部長和大學院院長，十年的大學校長，又擔任十餘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但除了幾千冊圖書外，兩袖清風，毫無積蓄，雖幾任要職亦從未置產；他自己在國外留學期間也曾過著半工半讀的簡樸生活。到了晚年仍沒有一間自己所有的房屋，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蔡氏七十歲生日時，他原在北京大學的同事胡適、蔣夢麟、王星拱、丁燮林，學生趙太侖，羅家倫等人，發起為他購屋祝壽的活動，並致函蔡氏說：「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房子住，書籍也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因此，我們商定這回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我

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奉獻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這也可以看作社會的一公共紀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我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此事後因抗戰軍興而未實現。民國二十六年，蔡氏偕妻女赴香港養病，經濟十分拮据，仍是租房子，經濟靠王雲五接濟，即連逝世後，醫藥費一千餘元、衣衾棺木的費用亦都是王雲五代籌的，後方由國民政府發給喪費五千元。

以清末翰林而身預光復會、同盟會，蔡氏是第一人；以開國元勳入主教育部，進而把畢生精力奉獻於教育事業，倡導學術自由，致力於現代科學，蔡氏亦是最澈底的一位。他嘗自言：「居北京大學校長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以短短數年的功力，把北大從一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主動活潑的戰鬥堡壘（馮有蘭語）。梁漱溟曾評蔡氏：「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全國，收果於後世。」蔡氏逝世，周恩來曾題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香港各界的輓聯：「打開思想牢獄，解放千年知識囚徒，主將美育承宗教；推轉時代巨輪，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卻尋自由為學風。」兩者均貼切將蔡氏一生的志業彰顯標舉，也的確無愧於「北大之父」的美譽。♣

(本文作者現職為警政署政風室科長)



諾貝爾獎牌



拾貳、廉吏列傳

